

百年回顧——

2019年北京紀念五四國際學術研討會概述

Centennial Review: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Memorial May Fourth” in Beijing 2019

羅 帥^{*}

Shuai Luo^{**}

陳 錦 紅^{***}

Jin-hong Chen^{***}

1919年發生在北京的五四運動，對於範圍更廣、內涵更豐富的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範圍的迅猛開展與持續影響，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文化運動因五四獲得命名，而後世有關新文化的研究，無不圍

* 作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 Ph.D. studen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作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 Ph.D. studen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繞五四這個「中心」展開。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創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思想論述和新文學作品，也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爲此，2019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在北京主辦了「百年回顧：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圖一）。這次會議由孫郁、程光煒和楊聯芬連袂發起，楊聯芬主持，海內外學者近七十人出席，其中有朱正、藍英年、劉納、黃子平、陳平原、許子東、何懷宏、季紅真、陳建華、夏中義、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張誦聖、魏簡（Sebastian Veg）、小川利康等。會議共進行兩天，分爲三場主題發言、九場小組討論，論文集收論文、提綱及發言稿共64篇，總計79萬字。與會學者圍繞相關學術論題，展開了深入討論與對話。



圖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百年回顧：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學者留影

為整體呈現此次會議的基本概貌和傾向，我們簡單統計了論文及發言稿出現的五四及相關研究的高頻詞彙和重要人名，粗略統計結果如下：

文化思潮層面，「革命」、「啟蒙」、「自由」、「民主」、「科學」、「性別」等10種關鍵字，共出現3295次。其中，「革命」（1066次）居榜首，「啟蒙」、「自由」、「民主」、「科學」等介於200-400次，「性別」（包括女性主義思潮等）約400次；為呈現五四文化人物研究的大致比重，我們抽樣統計了「魯迅（周樹人，1881-1936）」（928次）、「周作人（1885-1967）」（756次）、「胡適（1891-1962）」（391次）、「陳獨秀（1879-1942）」（397次）、「蔡元培（1868-1940）」（74次）、「李大釗（1889-1927）」（66次）、「吳宓（1894-1978）」（99次）、「章太炎（1869-1936）」／「章炳麟（1869-1936）」（93次）、「王國維（1877-1927）」（67次）、「梁漱溟（1893-1988）」（63次）、「章士釗（1881-1973）」（14次）、「杜亞泉（1873-1933）」（2次）等。根據這些數字，會議面貌略見一斑：五四運動一百年後，啟蒙與革命仍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80年代的「啟蒙與救亡」關係論爭，延續至今，後現代解構理論的視角，使啟蒙與革命關係問題的討論，具有深入和豐富的態勢。人物研究層面，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仍是此次會議討論的熱點，其中魯迅的關注度遠遠高於其他人物。相對而言，胡適、陳獨秀雖是新文化運動的焦點人物，但此次會議對他們的關注，明顯遜色於周氏兄弟。新文化陣營其他人物，以及中西文化調和論者、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研究，在人數與出現頻率上，均大為遜色。這與百年前那個各種思想和主張共生並存的百家爭鳴局面，形成鮮明對比。

一、說不盡的「五四」

五四好比一個歷史「沉積岩」，累積了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若干年、不同時代對這場運動的觀念、判斷，審視、反省，以及借言說而

表達的當下理想。1919年的五四運動，既是一次偶然發生的政治抗議運動，卻也是晚清自強運動以降，伴隨思想啟蒙、教育改革、立憲運動及辛亥革命諸因素合力產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更是新文化運動過程中的重要節點，為20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烙上不可磨滅的印記。五四之所以「說不盡」，不僅在於其錯綜的歷史面向，也與其當下性密不可分，如何言說和評價五四，在20世紀後半期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文化症候，隱含了現實文化政治的特定需求或規定。五四是一個不斷被建構的過程，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此次會議，不少學者從五四的海洋中淘金，挖掘其豐富的遺產，以求拓寬討論的空間，再現五四的現實性與歷史豐富性。

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的〈互為包孕的「新文化」與「五四」〉的主旨發言，重點辨析「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相互包孕的複雜關係。他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提法模糊了兩者的側重點：「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五四運動」以「救亡與愛國」為核心，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以「五四」涵蓋「新文化」。再者，「新文化運動」的源流和影響，都大於作為事件的「五四運動」。後者是前者推動的諸多可能性之一，兩者無必然聯繫。談前者，需回溯晚清，重在史家的考辨；論後者，需盡可能向後延伸，強調解釋與介入，是思想操練，也是目前五四研究應有的主流態度。作者呼籲與「五四」不斷對話，警惕救亡再次「壓倒」啟蒙，重視五四向當下的延展性，生動體現了五四的現實關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孫郁教授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話語方式——以1918、1919年的《新青年》為例〉立場相似，開宗明義以《新青年》分疏五四與新文化運動，試圖破除單一政黨話語帶來的簡單化弊病。作者分析五四前後新文化人的不同話語方式，解讀他們不同的精神側面，說明五四是一份無法告別的思想遺產，並將其話語方式概括為改良話語、批判話語、自審話語三種類型，指出前兩者不斷被史家敘述，後者則被漸漸淡化。實際上，五四前後新文化人的自審話語是最智性的，它

深藏的自我懷疑精神，具有一種超越時代性的品格。這一觀點豐富了王元化（1920-2008）等前輩學人對五四改良話語和批判話語相對單純的解讀。

部分學者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從「意義危機」角度審視五四時代的文化轉型。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黃健教授的〈意義危機與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的轉型〉關注中國新文化生成的特殊思想背景，概括其為「意義危機」下的「轉型」時代。作者指出：新文化在轉型時代充當了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急先鋒」，通過文學形式及話語權的轉變，探尋構建現代中國人的價值和意義世界的新路徑。中山大學中文系林崗教授的〈文化的應激反應——五四的啟蒙與救亡〉同樣關注「危機」時代的效應，以「抉心自食」一詞，描述五四思潮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逆反再接及其決絕態度，並借用「應激反應」闡釋其緣由。作者不滿以「啟蒙—救亡」模式分割兩個五四，提出五四新文化既是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走投無路的選擇，也是對未來相應行動的召喚。這一突變留下的鴻溝，仍待今人在古人命題基礎上，融合外來學理，方可彌平。

著名魯迅研究專家、湖南人民出版社資深編審朱正先生，以〈陳獨秀和胡適的交往〉體現其一貫的治學風格，從史料出發，鉤沉胡適與陳獨秀相識、相交、疏遠、最後貌離神合的複雜經過。文章一開始採用「抄書體」，作者退居「幕後」，讓豐富史料在台前說話，為讀者勾勒出一幅盡可能客觀的歷史圖景；作者不僅從兩人往來的書信、各自日記等紀實材料中尋覓線索，同時徵引他們所著序言、雜感、乃至與旁人交往的文字，兩位新文化幹將的豐滿形象躍然紙上；文章對陳獨秀、胡適交往的敘述也不止於陳獨秀去世，而是延長至胡適1949年推薦臺灣出版《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後，不僅提供了大陸《胡適全集》失收的重要篇目，同時涉及陳獨秀後期對俄蘇暴力革命形式的反省，對兩人的精神聯絡敘述更完整。朱正先生透過胡、陳的往來史，鉤稽出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兩條脈絡的交

錯，提供了觀照思想史的辯證路徑；特意提及陳獨秀晚年的自省和修正，尤其是他對民主政制的見解，隱含著作者對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探求和深入思考。

二、東西文明：調和與衝突

晚清以來關於中學和西學關係的辯論，至五四時期達到高峰，氣氛活躍，百家爭鳴。五四先驅者引介各種西方文化，尋覓中國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秩序的途徑，輸入學理，融化新知，渴望實現再造文明之夢，體現出五四新文化的多元化特徵。參會學者不僅還原當時的爭鳴狀態，注意到東西文明融合過程中的變形和陣痛，也能放眼未來，討論五四時期的某一理論，是否可作為當下「再出發」的借鑒或起點，在五四文明磨合的經驗中設想中國文化未來之路。

北京大學哲學系何懷宏教授的〈「東西殊途」與「無問西東」——梁漱溟東西文化論再思考〉聯繫當下中國的文化前景，細緻分析了梁漱溟的三種文化路徑，特別重視對東方文化複雜性的再發現。作者突出梁氏「世界文化發展」的觀點，對「富國強兵」思路表示擔憂，並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證明：在全球化大環境下，東西方思維方式、文化走向日益趨同，中國仍有戰爭、科技及文化價值尺度的隱憂，未來的文化之路仍需兼容東西。作者「無問西東」的世界主義文化立場接續了梁氏的思路，並嘗試突破其「東西殊途」的局限，再次印證了五四文化百年來不朽的現實力量。

南京大學文學院沈衛威教授的〈對五四新文化的制衡與反思——從《學衡》到《東南論衡》〉從兩種雜誌的學術眼光、人員配置、社會關係入手，展現「學衡派」憑藉中西兩重精神資源獲得的較強的文化吸納力。《學衡》遷址清華後，「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學衡》—《東南論衡》」構成的遠程文化聯繫，更體現出多元並存的新文化格局，及人文主義精神長久的生命力。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李

繼凱教授的〈「文化磨合思潮」與「大現代文學」建構〉將新文化看做「文化習語」與「文化創語」持續互動的歷程，進而把晚清至五四的文化潮流總結為「文化磨合思潮」。在諸多文化因素中，作者直言現代的姿態就是「涵容多種多樣的文化態度」，突出了五四的文化包容品格，深化了「現代」、「包容」兩者在歷史中的邏輯聯繫。南開大學文學院耿傳明教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傳統時代與百年中國文化的嬗變〉接續了杜亞泉、錢智修（1883-1947）等人的東西文化調和論，反思五四新文化過激的工具理性。作者認為：應從超時代的傳統中尋覓資源，調和現代性因素，輔助生成價值理性；與此同時，樹立起「第三方立場」，在更透明公允的公共平臺中，探索現代性目標實現的可能，與余英時先生提出的“common ground”有異曲同工之處。上述學者的研究，有力質疑了單一視角下的五四文化研究，體現了新文化強大的囊括力，從不同於啟蒙、激進的視角，重新定位了五四文化圈的格局。正是這種虛懷若谷的襟懷，能推動當下中國文化進一步現代化、世界化。

部分學者重點關注激進文化系譜，試圖梳理國家／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激進思潮在五四時期的傳播和演化，並以今日之視角，反省激進文化為現代中國帶來的得失。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孟慶澍教授的〈1920年代清華園中的國家主義思潮〉力圖釐清五卅事件前後清華大學內的國家主義討論，勾勒國家主義思潮初成時的歷史景觀，客觀上也描畫出五四運動後激進思潮內部的分野。國家主義本偏於保守，但在20世紀上半葉激蕩的國情下，卻能借民族主義的包裝而獲得部分青年學生的青睞，這不啻為思想史大潮中難以預料的轉向。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員妥佳寧的〈反專制運動中內含的專制因素：安那其視角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源頭上對孟慶澍予以補充。文章立於「安那其」（anarchy）視角，檢視新文化人的反專制文化立場自身，是否含有新的專制因素。作者「以激進反思激進」的獨特方式和清醒思維，是目前五四研究應有的理性因素，

展現了不同的研究姿態。美國肯塔基大學現代與古典文化學院羅靚教授的〈淺談作為國際先鋒主義的五四精神及其當代意義——以田漢、伊文思及羅伯遜為中心〉側重考查五四思潮中民族主義與革命文化的匯合，分析世界各國左翼文人對題中三人的影響，進一步闡釋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看似難以相容的三種潮流在特殊歷史時期得以並存的深層原因。作者指出：作為五四精神的一環，「奔向理想世界」的共同目標彌合了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雙重語境，對現代中國人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對未來人文研究方向也有所啟示。

五四時期西方文明的強烈衝擊，提供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多種可能性，但也因本身隱含的後殖民因素，衝擊了中國乃至東亞文明的主體價值，造成的文化創傷同樣需要反思。韓國白石大學中文系柳泳夏教授的〈敘事與文化解讀——為重構東亞話語〉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集中審視東亞各地區博物館與東亞歷史話語間的關係。在他看來，博物館的「常設展覽」不只是公共資源，同時體現該地區的歷史敘述邏輯。作者考察中國大陸國家博物館、臺灣歷史博物館、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指出其受害者邏輯的敘事模式和工業化、民主化的歐美化發展路徑。這種「受害者邏輯」與「啟蒙」應有的立場和包容存在悖論。作者期待東亞儘早走出受難歷史的感情化表述，警惕追求現代化可能帶來的主體性危機，尋求更平等、獨立、自由的文化方向。

後殖民語境中，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夏中義教授的〈從中國學案看「後殖民」闡釋潛能——重估「美學大討論」暨《人間詞話》評論的地緣語境〉與柳泳夏構成了對話。有別於柳泳夏通過後殖民理論審視歐美意識形態的東方主義，夏中義主要反思「蘇聯模式」對中國學界造成的文化創傷，將1950年代後長期控制中國學術界的蘇聯理論模式概括為「日丹諾夫（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 1896-1948）模式」，即批判主體與對象構成「宰製—被宰製」、「我們—他們」的主從關係。作者從「後殖民」理論框架審視該模式與「美學大討論」及《人間詞話》評論的關係，引導讀者反思文化極權模式的弊病，進

一步開發了「後殖民」理論的闡釋潛能。

與後殖民視野中「東方—西方」的「邊緣—中心」關係類似，百年來的女性與性別話題也在「邊緣」與「中心」之間徘徊。女性主義原本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大訴求，但在20世紀後半期卻從「主流」歷史話語和文學批評中退卻，以致有人認為，女性主義是80年代才從西方「引進」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聯芬教授的〈新文化運動與「女性主義」之誕生〉追蹤“Feminism”（女性主義）一詞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翻譯與傳播，分析了五四時期婦女問題討論能獨步一時的多重原因。文章以五四時期的代表性譯文為軸，追溯了「女子主義」、「婦女主義」、「女性主義」、「女權主義」和「婦女運動」等譯名的生成、運用與誤讀，有助於解決國內研究界長期存在的「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的無謂誤解與紛爭，在進行常識糾偏的同時，促進新文化與新文學研究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開拓創新。

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挑戰「中心」、還原歷史敘述多元性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其對文學現象的解釋力，至今仍然有效。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馬春花副教授的〈魯迅、周作人失和與羽太信子的「癡症」〉從一向被置於「禍水」位置的羽太信子（1888-1962）入手，探究周氏兄弟失和及圍繞這一事件研究話語的「權力」問題，主要考證周氏兄弟失和言說史中，關於羽太信子「癡症」說的歷史譜系，通過「二周失和」敘事對羽太信子形象的再現，說明她是如何被塑造成「閣樓上的瘋女人」；同時立足女性主義，呈現歷史公案的多種可能性，敘述她通過「癡症」表徵權力，最終以「歇斯底里式」的話語完成自我建構的過程。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符傑祥教授的〈「忠貞」的悖論：丁玲的烈女／烈士認同與革命時代的性別政治〉著重敘述革命時代丁玲（1904-1986）對「烈女／烈士」身分的認同過程，為丁玲身分意識的轉變找到了合理的性別文化譜系。他認為，作為新女性的丁玲，在拒絕禮教意義上烈女的同時，認同政治意義上的烈女，後者是對前者不完全的超越。丁玲不自覺的矛盾態度為「烈女／

烈士」的死烈情結左右，逐漸走向了現代的烈士崇拜。

此次會議有關性別的話題，不完全集中在五四，而以五四為聯結，貫穿晚清至當下，且為不少男性學者關注。西南大學文學院研究員黃湘金的〈權威的陷落與主體的新變——呂惠如與南京女學風潮譚論〉關注清末民初女子教育家呂惠如（1875-1925）經歷的兩次女學潮，同時涉及晚清婦女教育史、「五四」時代婦女群體生成的歷史過程。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張莉教授的〈關於當代作家性別觀調查的分析〉以問卷調查形式，考察137位當代男女作家的性別觀，探究五四至當下中國作家性別意識的變遷，從性別視角觀照中國人精神的現代化程度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正如作者所說，這一調查具有較強的個案意義與闡釋潛能，但由於還在初始階段，具體效果仍有待日後細緻觀察、分析。

三、周氏兄弟：「重讀」與「發現」

五四新文化史上，魯迅、周作人兄弟是兩座高峰。自清末留日以來，周氏兄弟反思國民性，堅持人文主義立場，在域外文化資源譯介、文學創作、文明批評等諸多領域留下了突出成果，百年以來得到學術界的不斷闡釋，也是此次會議集中討論的對象。這既是有限的言說空間中，知識分子藉以維持自由獨立的珍貴精神資源，也從一定角度反映出周氏兄弟反抗專制、主張「立人」等思路的當下有效性。參會學者們立足當下，重讀經典文本，在周氏兄弟研究的豐富成果上，努力發現創新的契機和可能，針對現實問題，尋找不同的研究視角，激發研究活力，深挖其在當下的意義和價值。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的〈聲的偏至——魯迅留日時期的主體性思想研究筆記〉梳理魯迅留日時期文章中「聲」的主題或意象，及其與魯迅早期「立人」觀念的關係，探求「聲的政治學」與「聲的倫理學」。在晚清的「寂寞境」與「擾攘世」中，是否出於「純

白之心」，成爲魯迅判斷思想言論誠僞的依據；作者認爲，「心聲」是魯迅留日時期「立人」方案的基點，也是「心性」、「自性」的表徵；尋求能發「雄桀偉美」之聲的「精神界之戰士」，方可敲開「寂寞境」；只有破除六種「惡聲」，才能廓清「擾攘世」。先覺者的「心聲內曜」由是而可成爲世界、歷史的推動力。黃子平呼喚「精神界之戰士」，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東教授的〈奴隸、奴才與奴隸性——重讀《阿Q正傳》〉則從對應面著手，由《阿Q正傳》出發，解讀「奴隸」、「奴才」、「奴隸性」等批判性稱謂間的交叉關係，從普遍混用「奴隸」、「奴才」的歷史語境辨析兩詞的實質性差異：「奴隸」側重「不安」和「戰鬥」，「奴才」的心態更接近「平安」、「麻醉」，造成區別的關鍵在於「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的「精神勝利法」。作者主張：「奴隸性」不只是阿Q的專屬名詞，而是貫穿魯迅作品及思想始終，日後雲譎波詭的解讀史，更體現了這一概念豐富的社會和歷史內蘊。反觀社會精神現狀，魯迅筆下的「寂寞境」、「擾攘世」，似乎「既是歷史，也是現實」，如此「無聲的中國」，是否仍充斥著難以言表的「奴隸性」？這是當今學界亟需面對、討論的問題，也是上述兩位學者目睹「沉默」世態後的疾呼與爆發。他們通過魯迅文字中的標誌性意象，品讀出別樣的弦外之音，意旨遙深，引人深思。

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中心魏簡教授的〈魯迅與章炳麟：新文化、保守主義與地方傳統〉研究魯迅與章炳麟的思想聯繫，強調傳統及浙東地方文化因素的作用，凸顯了魯迅精神資源的豐富性。作者試圖擺脫過去過於強調魯迅革命性、戰鬥性的弊端，立足於江南民間文化及地方政治組織形式，研究魯迅的「民主」、「解放」觀念與「國粹」的互動關係。在魯迅看來，江南的民俗不能被武斷地裁奪爲「迷信」而否定，應被視爲獨立於國族文化體系的民間文化脈絡，與「北京」爲代表的北方官方文化形成對比，起到賦予「政治」嶄新涵義的關鍵作用；魯迅對江南政治組織形式本真性的重視，呼應了章太炎對西方現代政治體制的質疑及對「自性」倫理價值的肯定，

召喚地方文化，就成了解放個人的必經之路。作者指出：魯迅提倡將「民主」、「國粹」的平等訴求落實於個體實踐，從而區別於訴諸階級、政黨的做法，其思想的獨特價值由此彰顯。

美國衛斯理大學東亞系宋明煒副教授的〈《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論科幻小說的詩學問題與魯迅對於科幻文學的影響〉另闢蹊徑，借用「科幻文學」類型學的概念和方法，使《狂人日記》中可能隱含的科學因素、科幻脈絡浮出紙面。作者向前追溯魯迅1906年前後閱讀、翻譯的科幻作品《造人術》的版本問題，考證英文原版與《狂人日記》意象的關係，同時假設魯迅對量子力學的接受，由此推斷《狂人日記》靈感來源的多種可能；向後延展至當代科幻小說對魯迅精神的追認，與科幻作家韓松的小說對讀，解析其中承續、轉化「狂人」、「鐵屋子」、「病」等經典意象的文本細節，指出兩者的精神聯繫，拓展了魯迅研究的視野。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建華教授的〈魯迅〈肥皂〉解讀——從商品的角度〉從商品社會、城市生活、性別視角重讀〈肥皂〉，詳細分析了「肥皂—欲望」、「四銘—落後」兩組象徵關係的聯繫：「肥皂」的「欲望」成分在於其「商品性」，而正是「商品」與「城市」生活、現代市場間的天然聯繫，衝擊了四銘賴以存在的舊式家庭。由此可見，〈肥皂〉已不同於《吶喊》中的國民性總體批判，更著眼於現實生活的細部描繪，魯迅個人思維方式的轉變也得以體現。

此次會議的周作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周氏與域外資源的關係，如探究周作人對日、朝等東亞文化資源直接或間接的移植與運用。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中文系洪昔杓教授的〈周作人的「東亞文明」意識——以武者小路實篤、柳宗悅對周作人的影響以及他對韓國文化的認識為中心〉一文，從東亞文明觀點出發，梳理1920年代開始周作人關注「韓國」（朝鮮）文化的具體情形及思想變動。作者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細緻分析了柳宗悅（1889-1961）、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等朝、日民俗、社會學者對周作人「新村」觀念、「東亞文明」意識的

多方面影響。文章落腳於周作人附逆的文化原因，認為周氏親日的立場，源自他在日本宣傳的「大東亞主義」中看到了世界主義文化理想實現的可能。作者並不因周作人附逆而全盤否定其文化選擇，而是透過朝鮮文化視點，看到周作人文學文化活動中對東亞文明內部互動的重視，為國內的周作人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新觀點，進而能反觀今日東亞的政治、社會、文明動態，思考未來的文化路徑。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院小川利康教授同樣關注周作人對武者小路實篤的接受，他的〈剖析〈人的文學〉的思想骨骼——藹理斯與新村主義的影響〉一文圍繞〈人的文學〉的精神資源問題，通過翔實的史料，考證周作人引用、轉譯與改寫藹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勃來客（William Blake，1757-1827）和武者小路實篤原文的具體情況，結合〈平民的文學〉，發掘周作人「神秘主義」文學思想的源流。作者進一步指出，儘管周作人因神秘主義思想的超驗色彩過強而無法完全接受，但青睞其中作為「表象」與「真實」中介的「想像」環節，這間接促成他1922年後接受象徵主義文學，其文學觀念也一步步走向充實、完整。

四、回到文學

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經歷了重要的歷史轉折，思想內核、語言表述、文體樣式、文學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突變，劃時代意義值得不斷挖掘和回味。參會者從縱橫兩向回到現代文學現場：敘述現代文學「前史」，再現晚清文學的原點意義；專注文本細讀，關注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的某一階段性成果；重演大陸、臺灣等地平行交叉的文學經歷等，方法得當，角度巧妙，提供新穎的個案研究，再現五四文學場眾聲喧嘩貌，從不同層面推進現有研究。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胡志德教授的〈*Wenxue and New Practices of Writing in Post-1840 China*〉援引「複寫本效應」理論，

探索清末民初時期「文學」意義的流變。「複寫本效應」是指：祛除羊皮紙上本有的文字，以便重新書寫；但曾有的字跡仍會顯現出來，影響附於其上的新文本。論文從後期桐城派、維新派與革命派的文論中篩選「文學」相關表述，細緻辨析「文」、「文學」、「文章」、「辭章」、「詩文」等術語範疇間的互補、互證、交叉、乃至矛盾曖昧；作者主張，晚清對西方「literature」（「純文學」）概念的借用，衝擊了從《論語》流傳至清代的傳統「文學」概念，其價值尺度、功能指向及內部構成都在發生結構性位移，從而導致「文學與學問」、「作者與作品」、「文學與倫理」、「審美與功利」、「作者與讀者」等關係逐漸變化，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考察具體文類時，論文重點討論小說的作用與定位，重視王國維「無用之用」在小說文類上的意義，質疑梁啟超（1873-1929）的文學工具論，深思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過程中，19世紀前現代「文學」觀念潛在的影響。「複寫本效應」指出了清末民初文學觀念對五四新文學的雙重刺激與影響；五四文學遺產在今天不斷被闡釋，也成為了當代的「複寫本」，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與胡志德類似，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丁校區亞洲研究系張誦聖教授也關注廣義的「文學制度」，她的〈臺灣「現代文學體制」的建構：從日治時代一波三折的白話文運動談起〉以臺灣「白話文運動」曲折歷史為研究對象，敘述臺灣「現代文學體制」的構建過程。針對所指模糊的「文學」概念，作者借用文學社會學的「場域」、後結構主義的「文本」等動態概念予以輔助，在理論立場上也對胡志德予以回應；文章打破時空局限，並置日本明治時期語言變革、五四文學革命與臺灣「白話文運動」，把臺灣文學放入東亞近百年被殖民的歷史，拓寬了研究視野；作者提出「非規範性」與「壓縮現代性」兩種概念，前者用以明確臺灣白話文運動發展過程的地緣特徵與特殊時代民族環境；後者則在價值尺度、最終目標等層面凸顯東亞知識分子追逐現代性過程的曲折，提煉出相關政治事件與個人遭遇背後的結構

性因素。

加州理工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明鳳英副教授的〈晚清摩登？：從「新小說」到海派「摩登」〉以「晚清摩登」概念追索晚清「新小說」到民初「摩登」小說的變化，勾勒晚清到民初小說發展的文化地形圖。作者認為：清末民初的「新」有兩個面向，其一呼籲革新，更富政治色彩；其二偏重通俗，面向市民社會。兩者都依歸於「新小說」旗幟下，此消彼長，又互為表裡。作者選取梁啟超與包天笑（1876-1973）的小說辯論公案為主要論述個例，強調包天笑在長期的小說創作生涯中對小說家「創作欲」而非「啟蒙性」的堅持，為民初「通俗小說」正名的同時，也在第二層面的「新」上，發掘了鴛鴦蝴蝶派與30年代海派小說的精神聯絡，進一步明確了近現代文學的內在共通性。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李怡教授的〈「成都模式」與現代文學發生的多重路徑問題——紀念五四一百周年〉反思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沿襲多年的「衝擊—反應」模式，進而發掘和梳理中國社會與文學自我演變的「內在現代性」。文章指出：不同區域、群體在近現代的不同精神演變，構成了各有差異的具體「模式」，如李劫人（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等代表的「內陸市民社會」的「成都模式」，張愛玲（1920-1996）代表的「平民／精英」相容的「上海模式」，老舍（舒慶春，1899-1966）、周作人代表的「旗人／知識分子」並存的「北平模式」。上述模式本身就蘊涵了現代性元素，彼此的對話、滲透和並進更啟動了異域資源的作用，最終形成了綜合的現代推力，彰顯了現代文學多元共生的結構特徵。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黃開發教授的〈論語派小品文話語的政治性〉借鑒文化政治理論，分析1930年代論語派作家小品文話語與現實社會的聯繫，探討其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等的文化政治理論，作者考察小品文、性靈、自由題材、閒適筆調和幽默等五個

關鍵字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政治意味，指出論語派小品文話語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小品文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化姿態，與雜文追求社會解放的政治象徵，共同構成了30年代文學複雜政治生態的一環，豐富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面貌。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李玲教授的〈《駱駝祥子》窮人本位的立場與歧途——老舍小說《駱駝祥子》的人學思想新論〉結合老舍的人文精神與底層身分，分析貫穿於祥子、劉四爺之間「貧富—權利」的邏輯關係。作者把老舍啟蒙思想的另類性總結為：「從自律自為的自由意志覺醒的角度來界定人的主體性」，這與《周易》中的「自強不息」民族精神一脈相承，體現出傳統的現代性轉換。這既延伸了老舍研究中「國民性批判」的思路，相對「北京文化」、「京味語言」、「階級分析」等角度也有其獨特價值。廈門大學中文系王宇教授的〈陸萍為何是醫生：重讀丁玲〈在醫院中〉〉嘗試擺脫「疾病的隱喻」思路，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引入醫學專業概念，以重探主人公陸萍的身分問題。文章指出：西醫的醫學人文主義、中西兩種醫療體系的衝突，為小說的啟蒙與人性話語製造了空間；西醫在戰時的價值、醫生在延安的特殊地位，是陸萍行為取得合法性的要因；西醫醫生（助產士）的職業身分，也使得陸萍相對於延安更多見的文藝知識分子更具現代知識身分，是更合格的啟蒙者；丁玲為代表的「五四二代」，與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一代」在對待「精神—肉體」關係上的不同立場，顯示出啟蒙精神史變遷的脈絡。

五、尾聲：如何紀念

20世紀中國，可謂革命的世紀。中國革命知識分子中，不乏堅守五四科學與民主理想而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著名報人曾彥修（1919-2015）便是一例。北京師範大學外文學院藍英年教授，從「今

日之人如何紀念五四」的角度，回憶了曾彥修的治學與情懷。曾屬於「五四之子」的一代，青年時期投身延安革命，1957年為完成單位反右「指標」而自劃右派。80年代提前退休後，專事蘇聯體制研究，其對日丹諾夫、斯大林（Joseph Jughashvili Stalin，1878-1953）及蘇聯問題的觀察和解釋，深邃敏銳；其堅持真理和自我反省的精神氣度，體現了五四的知識分子精神。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劉納教授，則以個人閱讀史入手，娓娓道來，對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精神狀態，進行了冷靜的回顧與反省。她的發言，真摯感人，引起參會者普遍共鳴。

楊聯芬教授在總結發言時，引用一百年前《新青年》的〈本志宣言〉，表達了對「理想新時代」的理解與期盼：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¹

2019年7月1日，會議在熱烈掌聲中圓滿閉幕。

¹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1日，頁2。